

中华上下五千年



文化百科丛书

苏连营 主编



上海出版社

209
2

K209

22

文化百科丛书

中华上下五千年

貳

主编 苏连营

辽海出版社



西河朔方之战

西河朔方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它距西汉王朝的京都长安，近在咫尺，匈奴以此为基地，每每出兵南犯，给长安造成重大威胁。因而，扫除该地区的匈奴势力，已成西汉王朝的首要战略任务，否则，京都长安，便永无宁静之日。

雁门战役后，匈奴的中部及左部在西起雁门、代郡，东至上谷、渔阳的漫长汉边境地带，不断寻找薄弱地区进行袭扰。

西河郡的一部和朔方郡一带，亦即河南地区，为今宁夏河套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它北靠阴山山脉，南距西汉京都长安四百多公里，约相当于骑兵快速机动两昼夜的行程。它的东面是云中、定襄郡，西北和西南为狼山、贺兰山山脉，水草丰盛，沃野千里，是匈奴右部河南、白羊王所部的重要游牧生活地区之一。秦朝名将蒙恬在击败匈奴后，曾在这个地区设立城塞，匈奴虽日夜想夺回此地，但由于惧怕蒙恬的军威，曾经一度躲避到很远的地方。到秦朝末年和楚汉战争期间，匈奴乘中原战起，又重新占领了河南地区。从西汉政权建立以来，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初期，匈奴均牢牢地占领着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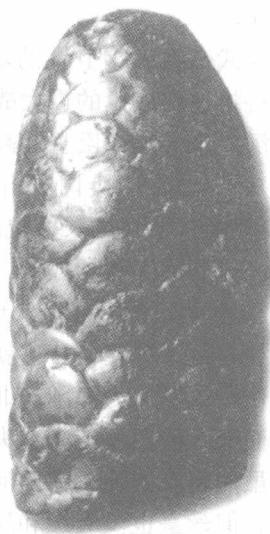
因为这个原因，汉军的作战在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方向为东北边境的渔阳、右北平郡，汉军以少数兵力采取守势行动。这个地区距西汉京师长安遥远，胜利和失败对西汉王朝的安危并无直接关系；另一个方向为西河、朔方地区，这个方向因为长期以来对汉京师威胁很大，因而，集中骑兵部队，乘匈奴在东北边境作战之，乘机进行突然袭击，一举扫除河南地区的边患。

匈奴军在西河、朔方战役前，似乎并未发现汉军的企图，因而，其作战的重点，仍然放在西汉的东北边境地区，以自己的左部兵力，于西汉防御兵力薄弱的地带行动，以便达到有限的作战目的。

汉武帝元朔二年春，匈奴左贤王军大举入袭上谷（今河北怀来地区）、渔阳（今北京密云境）两郡，杀掠人畜甚众。

在此之前，将军韩安国曾屯兵渔阳。韩安国在和匈奴作战中，从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匈奴军已远去。因而，韩安国在上书武帝时，请求撤去屯兵。但是，刚刚罢兵一个多月，匈奴大军即至。当时，韩安国只有七百余，安国率军出战匈奴，终因兵力弱小，被匈奴击败，安国军退入城内坚守。匈奴军掳掠千余人及大量畜产而去。汉武帝十分气愤，派使臣责备了韩安国一番。

汉武帝见匈奴军在东北的上谷、渔阳等地区进掠，于是，抓住战机，立即命将



松塔形墨

军卫青和李息率领部队西出云中（今内蒙古托托克地区），沿黄河北岸西进，避实击虚，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军进行深远距离的包围迂回。大军迅速进至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随即沿着黄河西岸，转而南进。卫青、李息军突然对楼烦、白羊王占领的河南地区的匈奴势力包围袭击，斩杀和捕获匈奴军五千五百多人，牛羊百余只，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区。白羊王、楼烦王仅率少数卫骑逃走，卫青大获全胜，率军从陇右地区胜利回师。

汉武帝对卫青在西河朔方战役中的卓越战功，大加封赏，“益封青三千户”，并封卫青为长平侯。跟随卫青出征的校尉苏建以一千一百户，封为平青侯，张次公为岸头侯。

汉武帝为表彰卫青的功绩，宣扬此次战役的胜利，以鼓舞全国抗御匈奴的斗志，特将这次战役的重大战果，下诏向天下宣告。

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今内蒙古乌拉特旗地区）、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由苏建负责修建了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对秦代所筑的长城也进行了加修，并移民十万人，居住于河南地区。从而河南地区得到巩固和加强。

守备渔阳地区的韩安国，由于在渔阳作战中失利，在受到汉武帝责备之后，即被派往右北平郡守备，这就更加远离了京师。韩安国由御史大夫奉行丞相职务的显赫地位，被贬斥为渔阳右北平，心中积愤，终于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中，呕血而死，使西汉王朝丧失了一位忠勇正直、足智多谋的贤良之才。

虽然，汉王朝人在西河朔方之战后，将上谷郡靠近匈奴的斗辟县造阳地区划给匈奴，但丝毫也没有缓和汉王朝和匈奴统治者的矛盾。反而更增加了匈奴对汉王朝的仇恨。

右贤王庭之战

汉匈西河朔方战役后，汉王朝在河南地区，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加紧向这个地区移民，通过对河南地区的巩固，使它成为长安的屏障，反击匈奴的战略基地。

匈奴军臣单于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死去。但是军臣单于之弟伊稚斜却发兵攻破太子于单，自立为单于。于单兵败后投向汉朝，汉武帝封他为涉安侯，于单数月后即死去。

失去河南地区后匈奴在东起代郡、西至朔方郡的漫长边境地带，以更加频繁的进袭行动，杀掠汉边境郡县的吏民。伊稚斜单于当政后，即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夏，派数万骑兵进袭代郡，大败代郡守军，斩杀了代郡太守恭友，掠略千余人而去。秋天，匈奴又派兵进袭雁门，杀掠千余人。元朔四年，伊稚斜单于以九万余名骑兵，分三路又攻入代郡、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北）、上郡（今陕西榆林南）等地，杀掠数千人，给此地百姓带来极大伤害。

匈奴右贤王对失去河南地区，更是怨恨之极，数次进袭河南边境地区，进入朔方郡，“杀略吏民甚众”。

匈奴军队对上述各郡县的进袭，使西汉整个边境地区受到严重破坏，所以，汉王朝决定调集兵力，力破匈奴。

汉王朝为了巩固新近统一的河南地区，确保朔方、五原等郡县的安全，决定集中十万大军，以消灭匈奴右贤王部为主，同时以一部兵力进击左贤王部。为顺利达成作战目的，汉军分为东西两个方向作战：西部方向，也即主要方向，由车骑将军卫青直接指挥三万骑兵，出高阙，并指挥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率数万人，兵出朔方，基本作战设想是消灭匈奴右贤王部；东部方向为次要方向，由大行李息、将军张次公率数万骑出右北平进击左贤王部，以牵制左贤王兵力，为主要方向创造歼敌的条件。

单于统率下的实力最强大的部分是右贤王部。它虽然刚刚遭受了丢失河南地区的失败，在河南地区的有生力量已被卫青军基本歼灭，但仍有相当强大的兵力。右贤王军由于对汉军力量估计不足，未作详细战争谋划，导致了再次作战的失利。

汉武帝元朔五年春，卫青统率大军由朔方等地渡过黄河，利用夜暗秘密穿越高阙要塞，直扑右贤王部。（约在今蒙古南部）卫青率领大军急驰六百多里，于夜间以秘密突然的行动包围了右贤王。当右贤王惊醒时，才发觉汉兵骤至，汉军击溃了自己的军队，于是惊恐异常，仅带其爱妾一人和护卫精骑数百人仓皇突围向北逃去。

卫青得知右贤王突围北逃后，即命轻骑校尉郭成等，率部追击数百里，右贤王侥幸逃走，未被汉军捕获。

卫青军在此次奇袭战役中，大获全胜，汉军俘获右贤王部裨王十余人，右贤王部众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十万头。卫青大军携带战利品凯旋而归。

同时，大行李息、将军张次公统率的东路军也取得了胜利。

汉军大胜匈奴军的消息传到京师，汉武帝非常高兴，封卫青为大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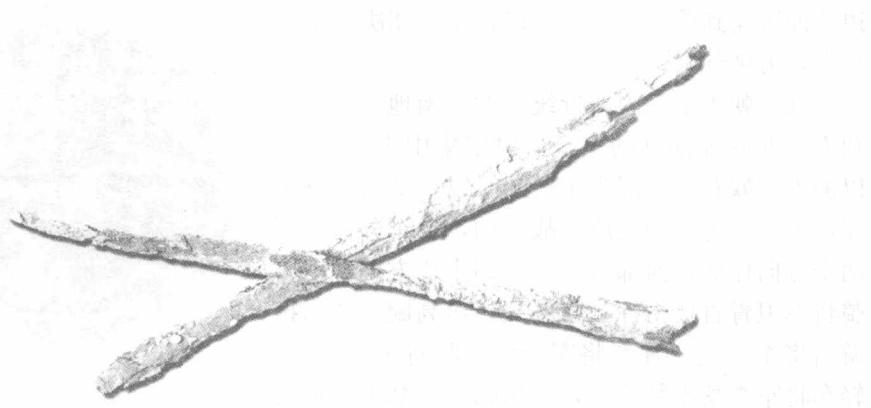
汉匈河南、漠南会战

元光二年，马邑伏击匈奴失败后，武帝以不满指挥马邑之战的将领王恢震怒之下，以“首谋不进”的罪名将王恢下狱，逼迫其自杀。另外马邑之战的主将韩安国，虽然在景帝初年就以抗击吴楚联军而闻名天下，但对匈奴素来怀有恐惧之心，老成持重有余，主动进取不足，更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致使战机白白丧失。通过马邑之战，暴露出年轻气盛的天子与宿将老臣之间在对匈奴作战中的矛盾，“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是武帝用人的一贯指导思想。为了物色能够担负抗击匈奴重任的人才，武帝的目光首先落到了宠姬卫子夫的弟弟卫青的身上。从此之



“单于天降”瓦当

后，卫青在众多的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武帝时期抗击匈奴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西汉的铁矛

卫青是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父亲郑季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平阳县小吏，作为一个私生子，卫青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充满了歧视与冷漠的艰苦环境中渡过的。正是这些苦难与挫折，却为他日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创造了条件。卫青成年之后，充当平阳公主的侍从骑奴。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卫青最小的姐姐卫子夫得到武帝的宠幸。后来，陈皇后的母亲，即武帝的姑母大长公主得知卫子夫怀孕，深恐威胁到其女儿皇后的地位，于是将卫青囚禁，准备处死。幸亏卫青的挚友、骑郎公孙敖得知消息，连夜带人劫狱，卫青方幸免一死。武帝知道此事后，遂任命卫青为建章监、侍中。从此，卫青摆脱了屈辱卑贱的社会地位。卫子夫被封为夫人后，卫青也晋升为太中大夫，成为朝廷的一名新贵。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侵入上谷郡，杀掠吏民。汉武帝任命卫青车骑将军，率领万骑，直出上谷抗击匈奴。同时，轻车将军公孙贺、骑将军公孙敖、骁骑将军李广各率万骑，分别从云中、代郡、雁门出塞，追击匈奴。在四将之中，李广、公孙贺均是沙场老将，而公孙敖少年从军，也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唯独卫青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战争的结局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公孙贺出云中后没有与匈奴遭遇，无功而还；公孙敖出代郡后被匈奴击败，损失了近七千将士，狼狈地逃回；而李广与匈奴单于主力相遇，兵败被俘，依仗过人的机智与精湛的骑射本领，夺取匈奴的战马逃回。四路大军之中，只有卫青一军在击溃侵入上谷之敌后，深入匈奴境内，直至龙城，斩获匈奴七百多人后凯旋而还。卫青初次出师就立下战功，武帝极为高兴，赐卫青爵为关内侯，以示嘉奖。

龙城一战战争，匈奴开始进行大肆的报复。同年秋天，匈奴骑兵猛攻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一带。第二年（即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再次入侵，先攻辽西（治今辽宁凌源西南）一带，杀掠两千多人，辽西太守以身殉国。匈奴继而西进，渔阳又告危急，屯守渔阳的老将韩安国几乎全军覆灭，只好龟缩在营垒之内等待援军。匈奴铁骑在横扫辽西、渔阳之后，乘胜西进，攻入雁门，杀掠千余人。就在这危急之际，卫青再次奉命出征，率三万将士前往雁门迎击匈奴；将军李

息出代郡，攻击匈奴后路，与卫青一路遥相策应。卫青率军直赴雁门后，与入侵匈奴展开激战，匈奴惨败，丢下数千具尸首狼狈逃窜。卫青二次出击均获全胜，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声威鹊起，在随即展开的著名的河南之战中，理所当然地成为汉军的主帅。

元光六年、元朔元年汉军的二次大规模出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既没有夺取匈奴的战略要地，也没有与匈奴主力接战，匈奴的实力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削弱。属于单纯的防御性作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攻入上谷、渔阳，杀掠吏民千余人。事实证明，汉军分兵把守，数路并出的作战方式并不能保障边境的安全，而且在汉军退兵之后，匈奴卷土重来，进行疯狂的报复。当时匈奴主要是在汉边境的东部连续向汉军发动进攻，但对汉朝威胁最大的却不是匈奴东部左贤王的部队，而是活动于阴山一带的右贤王与占据河南地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的部队。尤其是河南地，北接阴山，南距长安不过七百多里，西与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统辖的河西地区相邻，东则威胁定襄、云中郡。自从秦末汉初冒顿单于重占河南地后，一直就是匈奴南下的基地。因此，为了切断匈奴东西二部联系，彻底消除匈奴对关中地区的威胁，夺取河南地的战略意义特别重大。匈奴也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左贤王的军队连续进攻汉东部边境，企图将汉军主力吸引过去，减轻汉军对河南地的压力。

元朔二年，就在匈奴连续在东部边郡制造事端，以为汉军必然应接不暇，疲于救援之时，武帝不为匈奴在东线的进攻所动，采取匈奴东击，汉军西进的作战方针，果断地发动了著名的河南战役可以说，这是汉对匈奴开战以来第一次战略决战的胜利。武帝命令，卫青第三次出征，统帅数万大军从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沿黄河北岸向西北迅速挺进，一举攻占高阙（塞名，位于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北），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白羊王、楼烦王与单于王庭的联系。然后卫青立刻率兵南下，沿黄河直驱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完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等到白羊王、楼烦王察觉身陷重围之时，在河南的防线已经全面崩溃，只得率领残部西渡黄河，仓惶逃出塞外，这次战役，汉军歼敌数千人，截获牲畜十多万头，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取得了重大胜利。卫青对这次战役的指挥一改汉军在以往作战中以伏击、阻击、增援为主的作战模式，而采用整个战役都是在长途奔袭，迂回包抄的运动作战的过程中完成的，等到匈奴察觉到汉军的作战意图后，早已陷入汉军的重围，失败的大局已定。卫青也因为夺取河南地有功，被封为长平侯。

汉军攻占河南地之后，武帝采纳谋士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设置朔方（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与五原（治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二郡，命令将军苏建率领十多万人修筑朔方城（今内蒙古乌拉特旗南），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的旧长城。同时，从内地移民十多万人定居朔方，充实边郡人口，并调运大批粮食以补充军需民用从而使战果得到巩固，从此之后，河南地牢固地控制在汉廷的手中，成为汉军出击匈奴的一个重要基地。

河南地的失守及汉设置朔方、五原郡，对于匈奴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样一来右贤王的辖区——匈奴的右部，直接暴露在汉军的面前；河南地区土地肥沃，

气候温润，适于农牧业的发展，对匈奴经济影响极大。匈奴为了夺回河南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以数万骑兵攻入代郡，太守共友战死。夏，雁门又遭侵扰。四年，匈奴出动近十万大军，兵分三路，进攻代郡、定襄、上郡。五年，右贤王又率部侵入河南地，扰朔方。在短短的三年之中，匈奴连续出动大军不间断地侵扰边境，可见匈奴是多么急于夺回河南地。鉴于确保河南之战的胜利成果，未得到确保，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又发动了漠南战役。

在漠南战役中，汉军兵分二路，由卫青率领主力部分，统辖苏建等四位将军，率三万骑兵出朔方，攻击匈奴右贤王部；另一支军队由将军李息、张次公率领，出右北平（治今辽宁平泉北），牵制匈奴左贤王部，从侧翼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卫青大军经朔方出高阙后，向北出边塞六七百里，直奔右贤王王庭。右贤王自以为其王庭远离汉塞，汉军绝不可能至此，没有作任何防备，而是在帐中与娇妻美妾们饮酒作乐，直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兴夜之时，汉军突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尚在醉乡之中的右贤王被惊天动地的厮杀声惊醒，向北突围而去，其部众从裨王（小王）以下一万五千多人，牲畜十多万头都被汉军俘获。由于卫青在这次战役中功勋卓著，武帝特命拜卫青为大将军，诸将皆归属大将军统率。

漠南之战不仅确保了朔方郡的安全，几乎全歼匈奴右贤王部，而且从中断绝了匈奴单于主力与占据河西地区的休屠王、浑邪王之间的联系，为尔后的河西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匈奴伊稚斜单于为了报复汉军所发动的漠南战役，在同年秋天，派遣一万多骑兵攻侵代郡，杀害代郡都尉朱英，劫掠吏民千余人。汉武帝则针锋相对，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天，命大将军卫青率领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六将军，十多万大军出定襄数百里，直接与匈奴单于主力开战，斩首数千人之后退回汉塞。体整月余之后，卫青率六将军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万余人。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三千骑兵却与单于主力相遇，激战一日后，汉军损失殆尽。赵信原本是匈奴小王，降汉后被封为翕侯，这时见形势不利，率其残部八百余骑又投降了匈奴。赵信阵前降敌，苏建处境更为困难，于是弃军而逃，只身而归。这是自卫青出师以来首次受挫，损失三千多骑兵与二位将军。但在这次战役中，年仅十八岁的霍去病却以果敢无畏的气概远离大军，独自立下了战功，锋芒毕露。

赵信重归匈奴后，伊稚斜单于大喜过望，立即封赵信为右贤王，表示其权威仅次于单于，并将自己的姐姐嫁给他。赵信降汉后曾封侯拜将，对汉军情况相当了解，单于听从了赵信的建议，将匈奴主力远移至漠北。目的在于将匈奴主力迁徙至大漠深处，远离汉塞，诱使汉军深入，以逸待劳，等到汉军疲不堪之时再大举反击。

然而，伊稚斜单于与赵信都以为匈奴主力调往漠北后，汉军会立即出师北征大漠，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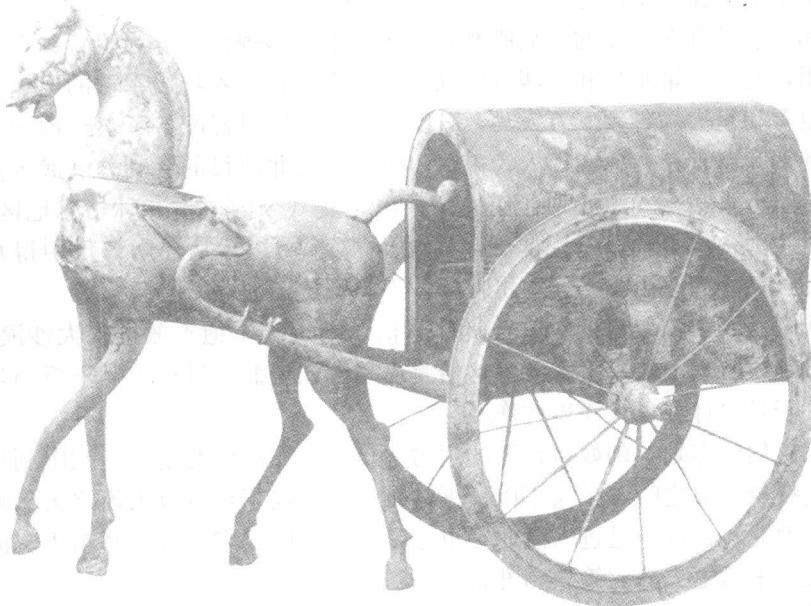


“单于和亲”瓦当

乎他们意料，汉军却调动大军西伐，发动了另一次著名的战役——河西战役。

汉匈漠北之战

浑邪王所部的投降后，西汉王朝将他们分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今陕西



铜辇车

榆林地区）、朔方、云中等五郡，定居在黄河以南塞外一带地区，称为“五属国”。这次战役和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后，汉逐渐在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今甘肃民勤地区）、张掖（今甘肃张掖以北）、酒泉（今甘肃酒泉）、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四郡，历史上称为“河西四郡”。这样，长期被匈奴做为从西方进袭中原战争策源地的河西地区，便逐渐变成了稳定发展的农业生产地区。后来西汉王朝又迁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多人，定居于陇西、西河、上郡、北地等地区。这些措施无疑对巩固河西、河南地带，发展当地社会生产，具有长远的重大战略意义。汉王朝由于夺得了河西地区，基本扫除了西部匈奴势力，遂将陇西、北地、上郡三郡戎卒减少一半。

匈奴奴隶主统治集团对其右部的惨败已无可奈何，投降匈奴的翁侯赵信向单于建议说，我大军退居大漠以北，以引诱汉军来攻，待汉军疲惫不堪之时，再行攻击，必然置汉军于死地。此建议，很受单于的重视。

右部被歼灭激恼了匈奴伊稚斜单于，于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秋，以两路大军，每路各数万骑，进袭右北平和定襄郡，杀掠汉吏民一千余人而

去。

汉朝消灭了匈奴的右部势力之后，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威胁，但东北方的匈奴左贤王和匈奴单于本部尚拥有相当的实力，仍然是威胁汉北部边境的安全和妨碍西汉王朝统一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大势力。

西汉王朝为了推进我国北方地区的统一，彻底消灭匈奴贵族奴隶主政权，在经过了近两年的发展经济、改革税收、积累财富、秣马厉兵的认真准备之后，决心向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的势力发动进攻。

汉武帝为了确保漠北的作战胜利，调集了十万多骑兵，分为卫青、霍去病两大骑兵集团，并以大量步兵和十四万匹马做为运送粮食、衣物、军械的运输大军。汉武帝让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人马，分路进兵，并给卫青配备了久经沙场的老将李广、公孙贺和赵食其、曹襄等人为裨将，以确保漠北战役的胜利。汉武帝把最艰难的任务交给霍去病军。原计划让霍去病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专力攻击单于主力；以卫青军出代郡（今河北蔚县境）。以后从俘虏口供中得知单于主力在东部，又立即改由霍去病军出代郡，卫青军出定襄。

汉武帝认为，匈奴伊稚斜单于听信赵信，断定汉军绝不敢进入大沙漠的判断，定会造成匈奴心理上的麻痹大意，这恰是汉军深入漠北，进行出其不意而攻击的天赐良机，于是决计深人大漠以北作战。

按照赵信的谋划，匈奴将自己的主力军，撤至大漠以北地区，试图利用汉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之时，予汉军以歼灭性打击。匈奴军自恃有大漠之天然险阻，汉军绝难渡漠北进，即令是进入漠北，也已是疲劳之师，定能被一举击灭。因此，对漠北决战，未做更充分的策划和准备。

此时，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受命后，即率军北进。此进，匈奴单于主力已退至漠北，并将其军需辎重转移至更远的后方。卫青出塞后，即得知匈奴主力确实在自己的前方。因此，他便命令前军李广部与右将军赵食其部合兵一处，从东路前出，掩护自己的侧翼，攻击单于军的左侧背，卫青亲率主力向单于进击。

大将军卫青所率之军向北前进了一千多里，渡过了浩瀚的大沙漠，突然发现单于主力军正严阵而待，于是卫青当即命令部队用武刚车“自环为营”，以防匈奴突然袭击，随即派出五千名骑兵向匈奴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匈奴单于也派出万余名骑兵迎战汉军。两军激战至日没，卫青抓住时机，派出主力部队从左右两翼迂回包围匈奴军。伊稚斜单于见自己的部队被汉军包围，且汉军人数众多，兵强马壮，继续作战对自己十分不利，惧怕兵败被杀，便乘风沙弥漫黄昏之际，率领数百名壮骑突出汉军的包围，向西北方向逃遁。两军激战至深夜，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单于已于黄昏前逃走，于是卫青急令轻骑追击，自己也立即率主力随后追赶。一直追到天亮，驰行二百多里，也未发现单于的方向。这时，匈奴兵已溃散，被汉军斩杀一万多人，卫青率军追至祁连山（今蒙古纳柱特山）赵信城，缴获了匈奴屯集的粮食等军用物资，补充了自己的军队，停留了一天，放火烧毁了剩余军资和赵信城，胜利回师。

为更有效地与匈奴作战，骠骑将军霍去病军，便挑选从骑侯赵破奴、昌武侯安稽、北地都尉邢山、校尉李敢等充任裨将，并以原匈奴降将归义侯复陆支和伊即靬等人为向导，随军负责宿营保障、寻找水源、草场等。

大军出代郡，向北进击，越过荒芜人烟的大沙漠，长驱直进两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霍去病军对左贤王军发动猛烈突袭，左贤王军大败，率亲信将领弃军而逃，霍去病趁胜追击，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斩比车耆，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俘虏和斩杀匈奴吏卒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匈奴左贤王的军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了。

为纪念这次重要战役的胜利，霍去病命人在狼居胥山上修建了一个纪念台，同时又在姑衍山（今蒙古乌兰巴托市东郊）下，修了一个祭天台场，众士卒举起火炬，祭告天地，慰藉壮烈牺牲的英灵，将士们庆祝胜利的欢呼之声响彻云霄。霍去病军满载胜利的荣誉，凯旋而归。至此，惊天动地的汉匈漠北战役，遂以汉军胜利而告终。

再说匈奴伊稚斜单于突出汉军包围后，率领数百护卫骑兵狼狈逃走，这时匈奴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不久，伊稚斜单于才与其溃散的军队会合，右谷蠡王不得不取消自立的单于称号。

为表彰卫青和霍去病在漠北战役中的赫赫战功，西汉王朝设置了大司马的官职，卫青与霍去病同时被授为大司马，其地位仅次于丞相，成为全国统率武装力量的最高官职。另外又下诏历数霍去病的功劳。

汉武帝还为霍去病修造了一栋府宅，霍去病却对武帝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使汉武帝更深感霍去病是一位忠勇清廉的优秀将帅。不幸的是，这位仅仅度过了二十四个春秋的青年将领，竟于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九月，也即漠北大战后的三年病逝。对霍去病之死，吏民皆悲痛不已，汉武帝特为他举行了极其庄严的葬礼，以属国之军穿戴黑衣铁甲，列队送葬，送葬队伍从长安一直排列到今陕西兴平县的茂陵墓地，长达一百多里。在威严肃穆的气氛中安葬了这位叱咤风云的战将。“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的巨大墓碑，现今仍然矗立于茂陵的墓地上。

汉匈天山会战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在进击匈奴



卫青像

右贤王军取胜后胜利回师时，突然遭遇单于主力军的袭击包围，李广利军损失过半。骑都尉李陵所率五千步骑兵也被匈奴重兵包围，李陵投降了匈奴军。史称“汉匈天山之役”。

汉匈自浚稽山之战以后，形势日趋紧张，虽然此前在浚稽山之战中，匈奴取得了歼灭汉军两万余人的胜利，但这并不代表着汉王朝势力的衰落。虽然其中有一些失败，西汉王朝消灭匈奴、统一我国北方和大西北的决心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动摇。

太初三年冬，汉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征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一带地区）后，胜利回师，匈奴想乘李广利军回师的机会，截击李广利军，因见李军兵威势壮，未敢动手。

西汉王朝击败大宛，斩大宛国王而归威震了诸国和西域地区，汉的势力大大增强，匈奴势力进一步削弱。西域诸国纷纷脱离匈奴，而臣服于汉。这时汉武帝想趁势再进击匈奴，便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下诏说：“高皇帝（指刘邦）曾受匈奴平城围困之耻，高皇后（指吕后）受到匈奴书信的侮辱，过去齐襄公曾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从而明确宣布了与匈奴决战到底的决心。

匈奴且口侯单于，见汉朝气势正盛，惧怕遭到汉之进攻，因而将过去所扣留之汉使者不愿意投降的人统统归还于汉，赵充国等此时即被放回，浞野侯赵破奴一年后也逃回。汉王朝为匈奴的卑词和友好表示所感动，遂派苏武、张胜、常惠为正副使者前往匈奴，以重礼厚币赠单于。他们到匈奴后，副使张胜因秘密与汉投降匈奴者策划劫持单于阏氏归汉，不料事机败露，三人皆被匈奴扣留。且口侯单于自此以后，日加骄狂，不时流露出与汉相抗衡的情绪。因而，汉武帝决计向匈奴发动进击。

为消灭匈奴右贤王的势力，保障其至西域通道的安全，进一步切断匈奴与西域一些国家的联系。为此，汉军决定向天山方向进击，以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出酒泉；骑都尉李陵率步骑兵五千人，为李广利将军的辎重护卫军。可以看出：汉的主要兵力进攻居于酒泉、敦煌以北地区的右贤王军，同时再以部分兵力出西河和居延以北，深入匈奴境内，寻歼匈奴军。

以因杆将军公孙敖率一部骑兵出西河，向涿涂山，（亦称涿邪山）进击，与强弩都尉路博德所率之骑兵部队会师于此。

匈奴且口侯单于本部的兵力远在今阿尔泰山以北地区，匈奴为竭力保住其右部的势力范围，常以游击骑兵活动于汉匈酒泉、敦煌边境一带地区，并伺机以机动骑兵支援其右部的作战。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所率的三万骑兵部队沿天山北路进击匈奴，顺利击破右贤王军，斩杀匈奴军万余人，回师途中，进至今新疆伊吾地区时，突然遭到单于主力军的包围袭击。李广利军势孤力单，苦战数日，粮食已尽，死伤十分之六七，仍不得解围。李广利遂命令假司马赵充国率精勇骑兵数百人在前面突围。李广利率主力随后跟进，经过拼力冲杀，才得以突围。赵充国负伤二十余处，李广利军仅剩一万多人而归。

李陵所率之五千步骑军，由于李陵不甘于做辎重护军，主动向汉武帝请求先出

兵北进的要求，李陵决心以少胜众，以五千步兵和少量骑兵直捣单于庭。于是，武帝命李陵九月率兵出居延。李陵军北进一千多里，至今阿尔泰山以北（今蒙古巴彦洪戈尔地区图音河下游一带），与单于本部军八万多骑兵遭遇，展开激战。平日李陵曾对其所率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射术训练，加之部队多为荆楚之勇武侠士，因而作战非常英勇，匈奴军将李陵部队包围于谷地之中，李陵以大车之营，以弓箭猛射匈奴军，匈奴兵应声而倒，李陵军与匈奴兵大战数个回合，前后共射杀、斩杀匈奴兵一万多人，匈奴兵非常惧怕。李陵率军且战且走，但由于李陵孤军无援，被团团包围于大山之中，李陵军粮食和弓矢已尽，最后只得让全军散走，李陵遂投降匈奴。

事后，汉武帝对赵充国率敢死之士奋勇突围，却大加赞赏。

就李陵投降匈奴一事司马迁则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他以不足五千人马，与敌数万人而战，矢尽粮绝，杀敌过万，古代名将也难与其相比，不应判罪。汉武帝听罢司马迁的话，非常气愤，立即给司马迁定了宫刑之罪。我国历史上这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是在身受宫刑之后，完成了他永世不朽的伟大历史巨著《史记》的。

张骞通西域

在西汉时期，西域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在的新疆地区，而且还包括跟这一地区山水相连的葱岭以西，一直到现在苏联的巴尔喀什湖一带。甚至对更西、更远的地区，当时也泛称西域。

当时，西域各族建立了许多“行邦”和“城邦”。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西汉时期的杰出外交家张骞〔qiān 千〕和他的随从，就肩负着汉武帝的政治使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至今誉满中外的古代“丝绸之路”。

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东西交通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中外学者有的把它跟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有的把张骞称为“中国的利文斯敦”都无不说明张骞在历史上的杰出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勇当重任

张骞，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从张骞出使和去世的时间来推测他大约生于汉文帝（公元前 179～公元前 157 年在位）的中后期；到汉景帝（公元前 156～公元前 141 年在位）时，他已经进入青年时代了。

汉文帝、汉景帝时，是汉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卓有成效的时期，历称为“文景之治”。在这期间，西汉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政权，一面打击和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一面又不得不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实行所谓“与民休息”，逐渐扭转了汉朝初年经济凋敝、农田荒芜、人口大量减少的局面。张骞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到汉武帝（公元前 140～公元前 87 的在位）即位时，距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公元前 206 年）已经六十多年了。

汉朝已开始跨入了它的全盛时期。据记载，当时封建国家的各种物资堆如山积。长安仓库里的钱币成千上万，有的连穿钱的绳子都烂断了，以致于无法计算。

粮库里也是新粮压着陈粮，层层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里，有些竟腐烂不可食。在街头巷尾，田野阡陌〔qiānmò 千末〕之间，膘肥体壮的马匹在嘶鸣奔驰，一些达官贵人连骑乘母马都觉得有失体面。商业、手工业也发展起来。长安的市场上，店铺林立，各种货物，花色繁多。一些富商大贾更是家财万贯，富似王侯；他们世代经商，周游天下，无所不至。

这时，张骞正在朝中担任“郎”的职务。这是一种地位较低的官。但是，“郎”又是地主阶级子弟追求仕进的捷径，他们有较多的机会接触最高统治集团，能够较多地了解当时的国家大事；最高统治者也往往从这些郎官里选拔人材。所以，当汉武帝凭借着国家富庶、兵强马壮的有利形势，决心对匈奴实行军事反击的时候，张骞便从一个普通侍从，很快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匈奴是我国北部的游牧民族。楚汉战争期间（公元前 206~公元前 202 年），在项羽和刘邦争夺中原之机，匈奴冒顿〔mòdú 墨毒〕单于就已经在扩充自己的势力，陆续征服了周围许多部落，控制了我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匈奴往往“南下牧马”，匈奴贵族也乘机到中原地区掠夺人畜和财物，对汉朝威胁很大。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冬，匈奴冒顿单于率领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汉高祖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迎战，结果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被匈奴精锐骑兵围困了七天七夜，援绝粮尽，险些丧命称史。面对强大的匈奴，汉朝初年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只能消极防御。匈奴贵族却不断向汉朝进攻。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 166 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攻入朝那、萧关（均在今宁夏固原东南），杀死汉朝都尉，掠夺大批人畜财物，并进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汉朝的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匈奴的侦察骑兵甚至逼近了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西北）。战争的气氛一时笼罩着长安。

原来匈奴冒顿单于小时候就曾经在月氏做“人质”。后来，冒顿单于击败了月氏。到冒顿单于死后，老上单于又杀死月氏王，文帝时，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贵族的奴役和凌辱，被迫离开世代放牧的居住地，向西长途跋涉，迁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并在那里重建家园，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所说的大月氏。大约在汉武帝时（公元前 139 年至公元前 129 年之间），大月氏又受到乌孙（在今伊犁河、伊塞克湖一带）的攻击，再次向西南迁到妫水（今阿姆河）流域。

汉武帝从匈奴降人的口供中获悉，大月氏西迁以后，月氏王想报杀父之仇，常常“怨恨匈奴”，想与他人联合起来，打击匈奴。于是武帝决定立即派人去联合大月氏。因为如果联合了大月氏，就等于切断了匈奴的“右臂”，匈奴就处于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这样，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就有了胜利的把握。

但是，出使西域，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著名的河西走廊。是当时通往西域的唯一交通要道。溯渭河西行，越过秦岭，然后再折向西北，渡过黄河，好不容易才到了甘肃境内的河西地区。那里河流纵横，山岭连绵，在西北部的祁连山以北，合黎山和龙首山以南，乌峭岭以西，有一条狭长的绿色地带，这就是那里遍布着沙漠、谿谷和山地，在水草茂密的天然绿洲上，驻扎着匈奴人的稀稀落落的帐幕和畜群。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控制着这个咽喉地带。

匈奴势力已经伸张到那里，穿过河西走廊，继续前进的西域。天山一带和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处于匈奴贵族的统治之下。匈奴日逐王还设置了僮仆都尉（奴隶总管），经常率领几千骑兵，往来于焉耆（今新疆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东北）、尉犁（今新疆尉犁北）一带，监视西域各族，征收繁重的赋税并经常掠夺财物。由于西域地广人稀，兵力分散，形不成统一力量，西域各族多数被迫屈服于匈奴。在这种情况下，要横贯举目荒旷、长达三千里的塔里木盆地，要翻越冰雪覆盖、岩崖险绝的葱岭，就更加艰难了。

当汉武帝下令选拔人才的时候，地位低微的张骞，便勇敢地站出来，主动要求承担通西域的历史重任。

张骞受汉武帝的派遣，肩负着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政治使命，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带同随从一百多人，踏上了漫长的征途，向西进发。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也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凿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探险和旅行。

张骞一行，由奴隶出身的匈奴人甘父作向导，从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南）出发，很快进入河西走廊。

但是，队伍部遭遇到了匈奴骑兵。张骞一行全部被俘。匈奴骑兵把他们辗转押送至匈奴王庭（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匈奴单于不准他们经过匈奴控制区前往西域，一直把他们拘留了十年光景。

十年中匈奴单于为了软化、拉拢张骞，张骞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完成使命的坚强意志。他在匈奴贵族的威逼利诱下，坚贞不屈；在困难和曲折面前，也没有灰心丧气。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赞扬他“持汉节不失”，这说明张骞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对汉朝始终忠诚不渝。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张骞一行趁匈奴的监视有所放松，便毅然逃出匈奴地区，继续向西进发。他们首先取道位于天山南麓的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从那里穿过沟通天山南北的重要交通孔道，进入焉耆，再从焉耆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龟兹（今新疆库车东）、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到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一路上，张骞一行跋山涉水，备尝艰辛，加之又是匆匆逃出，经常缺粮断水，有时一连几天见不到人烟，只好靠甘父沿途射猎禽兽充饥。他们一连奔波了几十天。

终于到了大宛，看到大宛农业发达，盛产稻、麦和葡萄酒。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富饶，想跟汉朝交往，只是“欲通不得”。大宛王迎接张骞了，特意派遣译员和向导，把张骞一行专程送到康居（约在今咸海以东、费尔干纳西北，今苏联乌滋别克和塔吉克境内）。康居人又把张骞一行送到大月氏。

但是，大月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大月氏迁到妫水以后，征服了大夏（在今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之间，今阿富汗北部）。局势较安定，这一带土地肥沃，物



太医丞印

产丰富，又很少受到外敌的侵扰，人民安居乐业。大月氏人也由游牧生活开始转为定居，已不愿再跟匈奴打仗。所以，汉朝在谈及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的事，月氏已毫无兴趣。不久，张骞渡过妫水，到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在那里了解到许多情况。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张骞决定回汉。

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张骞一行踏上了归途。为了避免匈奴的势力，张骞决定改变路线，由来时的“北道”，改走“南道”。他们从大月氏出发，翻过葱岭，沿昆仑山北麓向东行进，经过莎车（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地，在进入羌人居住地时，再次被匈奴骑兵俘获，又被扣留了一年多。

到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 年）初，匈奴军臣单于死后，军臣单于的弟弟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并打败了军臣单于的太子，匈奴贵族发生了内讧。同年春，匈奴太子于单逃到汉朝避难，被汉武帝封为涉〔zhì 治〕安侯。大约与此同时，张骞也乘匈奴内乱的机会，带着他的妻子和甘父，一起回到汉朝。这就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经过。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从公元前 139 年出发，到公元前 126 年回到汉朝，历时十三年之久，张骞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政治使命，汉朝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出发时一百多人，回来时只剩下张骞和甘父两个。但是，张骞此行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他的直接使命。它在我国历史和东西交通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骞第一次通西域以后，带来了有关我国新疆和广大西南亚地区的丰富知识和大量见闻，大大地开拓了我们古人的地理视野，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使人们知道了新的天地。这就为进一步发展我国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沟通国际间的友好往来，促进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谱写了新的有历史意义的一页。在今天，张骞报告的内容，不仅成为研究东西交通史的极为珍贵的史料，而且是我国和伊朗、阿富汗、印度等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汉武帝对这次通西域的成果十分满意。为了表彰张骞的功绩，汉武帝封他为太中大夫。匈奴人甘父，也因担任向导、佐助张骞有功，得到了奉使君的称号。

公元前 123 年，张骞以校尉的军职，跟随卫青再次出击匈奴。

张骞对匈奴的情况比较熟悉，再加上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和丰富的地理知识，所以，在这次出征中，张骞担任了汉军的向导。他不仅为汉军指点行军路线，而且能



木猴

够判断水草、河道的分布，使汉军及时找到水源和草地，不致过于疲劳和饥渴，顺利推进数百里。

这年春，汉武帝因张骞屡建军功，又曾出使西域，封他为“博望侯”。

由于汉朝和匈奴的战争紧张激烈，旷日持久，匈奴仍然控制着汉朝到西域的交通要道，张骞便试图由我国西南地区，经过现在的印度，前往西域。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通过“西南夷”。“西南夷”是汉朝统治者对散居在我国西南地区（今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各少数民族的总称。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社会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它们有的还处于原始社会，有的已进入阶级社会；有的已经定居，以农业为主，有的则随着牛羊迁徙，过着游牧生活。这些少数民族中比较大的有：夜郎（今贵州西南部）、滇（今云南昆明一带）、邛都（今四川西昌）以及徙（今四川天全）、筰〔zuǒ 昨〕（今四川汉源）、冉駩〔rǎnmáng 染忙〕（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白马（今甘肃成县西）等。张骞主张由“西南夷”前往身毒，再转道大夏，以寻求通往西方的途径。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于是，张骞在汉武帝的支持下，从蜀郡和犍为郡派出使者，分成几路，经冉駩、筰都、徙、邛等地，向西南进发。

各路汉使分别前进一两千里，便中途遇阻，南路使者只到昆明（在今云南大理）为止，没有能够通身毒。当汉使到达滇国时，滇王当羌问：“汉跟滇相比，谁大？”当汉使到夜郎时，夜郎侯也这样问。我们平常所说的“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

通过汉朝先后派出使者十余起，进而进一步考察并了解了西南地区，恢复了同西南地区的交通，密切了汉族同西南各族之间的关系。同时，汉使还得知，从当时的昆明继续西行一千余里，有一个“乘象国”，名叫滇越（约在今云南腾冲、龙陵一带），蜀地的商人经常带着货物去滇越进行贸易。这就是说，蜀地的商人跟滇越的交往由来已久，而张骞在大夏见到的蜀布和邛竹杖也是通过这里运往身毒，然后才转到大夏去的。今天看来，那条通往身毒的捷径，也就是从我国四川、云南，经过今天的缅甸和印度，通往西亚的交通要道。早在著名的“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以前，我国和东南亚的交通要道就已经畅通，这是中缅、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由此可见，当时的汉朝使者尽管没有能够到达印度，但是，张骞的判断是大胆的，准确的。这充分表现了张骞作为古代探险家、旅行家的杰出才能。

十几年后，也就是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当汉朝打败了匈奴，同西域的交畅通之后，汉武帝又继续经营西南地区，并在邛都设置越嶲〔suǐ 髻〕郡，在筰都设置了沈黎郡，在冉駩设置了汶山郡，在白马设置了牂牁〔zāngkē 献科〕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归服汉朝，汉武帝赐给滇王印绶，并设置了益州郡。这样，不仅西南地区归入汉朝管辖，汉族和西南各族关系更为密切，而且对进一步发展我国同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到东汉时，益州郡又改为永昌郡（郡治在今云南保山），继续成为对外通商的商贸要地。

鉴于张骞西南探险没有成功，汉武帝决定调整对匈奴战争的具体部署，把主攻